#####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历史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寻找救国的武器，掀起了一场旨在引进西方“技”、“器”的洋务运动，标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器物文化之路走到了尽头。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救世的主导文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先进的中国人痛切感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破产和专制政治的腐败，其中政治制度是振兴中华的关键，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这场旨在实现民主的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朝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百日维新，这场以日本近代改良运动为榜样的爱国运动只有103天的生命，以悲剧落幕，表明中国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一是辛亥革命，这场用暴力摧毁封建王权政治的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第一次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建立起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这本来是中国洗刷半个多世纪民族耻辱，振兴中华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天性软弱，袁世凯倒行逆施，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之路。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
救国之路何在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于是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五四爱国运动又促发了整个国民的民族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复苏。一批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转换，将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自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幕开启。
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史表明，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锁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救亡运动客观需要选择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纷繁的各种思潮中，不断地扬弃，用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某一种思想模式内，而是将其拿到能否解决中国最紧迫问题的天平上衡量，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就取之，否则就弃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呈现出进步性，因此，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深浅不一地受到了影响。
在五四时期，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互助论认为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互助论将伦理主义视为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互助本能”的思想是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其底蕴在于人人是天生自由、平等的，毋需借助权威和强制。它的内核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恶”的批判，期盼建立一个人类普遍道德的“善”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欢迎互助论，是因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失望，企图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这两者看成绝然相反的二极，而是努力将其调融在一起。五四运动后，在神州大地涌动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都是这个理论在社会中的实验。但这场企图脱离社会，在工厂、乡村实行共产主义生活，养成“善”势力以达到改造社会的改良运动，在各地实验相继失败。这表明这些思想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可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失败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反省。十月革命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提出既然中国与俄国在国情上有许多相同，那么革命可以在俄国取得胜利，就没有理由在中国不能成功！成功的秘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社会。于是他们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这使他们第一次感悟到，要救国不能局部的改良，应从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实行彻底的改造。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掌握，经济、教育、文化、道德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胜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近代中国的这段真理追求的曲折艰难之旅足以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寻找救亡图存思想利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国情”相结合才能成为救国真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文化史的角度考量，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场向东方文化场转移时，必须与东方文化相融合，也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个改造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它既要超越中国旧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植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既要满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需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救国的真理。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国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导星”。首先他们运用唯物史观，指出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因此，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他们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剖析了中国特殊的近代二元社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时代及认识的局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也是肤浅的，对中国的国情还无法从本质上去把握，思想上也掺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因此在传播、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存在着教条主义，提出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由于没有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武装起义理论，从而导致中国革命遭到两次大的挫折。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代表是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本本，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中国革命才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他和战友们独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中具有创新精神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